

中国现代文学史学习
参 考 资 料

(二)

抗日战争前期

(1937—1942)

二、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成立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宣言^①

一九三八年（民国二十七年）

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才只有短短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中，内忧外患，没有一日稍停，文艺界也就无时不在挣扎奋斗。国土日蹙，社会动摇，变化无端，恍如恶梦；为唤醒这恶梦，文艺自动的演变，一步不惜的迎着时代前进。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浮动的，脆弱的；其实呢，它却是一贯的不屈服，不绝望；正因为社会激烈的动荡，所以它才不屈不挠的挺身疾走。文艺家因生活窘迫，因处境困难，有的衰病，有的夭亡；可是前仆后继，始终不肯放弃了良心，不肯为身家的安全而畏缩。这二十年中的文艺，是紧紧伴着民族的苦痛挣扎，以血泪为文章，为正义而呐喊。未曾失节，未曾逃避，能力容有不足，幸未放弃使命。作品在量上容或太少，在质上或嫌微弱，可是检读二十年来所有的著作，到底能看到社会的良心与最酸辛而纯洁的情感。

^① 录自《文艺月刊》战时特刊第九期，本期尚载有《发起旨趣》及简章全文，均略。

就最近的事实来讲，“九·一八”与“一二·八”后，文艺界无日不在忧心国防，因而时时将东北四省人民的苦痛，与侵略者的暴行，血淋淋的提献在全国的同胞的眼前，以期共赴国难，重整山河。成绩若何？未敢自是；救国图存，咸具此心。

芦沟桥敌军的炮火，是缠紧了东北四省的毒蛇，又向华北张开血口。由华北而华中，而华南，京沪苏杭继成焦土，武汉湘粤迭受轰炸。我们几十年来千辛万苦所经营与建设者惨被破坏。我们的父老弟兄姊妹横遭屠杀奸劫，连无知的小儿女，也成千论万的死在暴敌的刺刀下。日本军人以海陆空最新式的杀人利器，配备着最残暴的心理与行为，狂暴代替了理性，奸杀变作了光荣，想要灭尽我民族，造成人类历史最可怖可耻的一页。除非我们全无血性，除非我们承认这野兽应在世上横行，我们便无法不舍命杀上前去。为争取民族的自由，为保持人类的正义，我们抗战；这是以民族自卫的热血，去驱击惨无人道的恶魔；打倒了这恶魔，才能达到人类和平相处的境地。

这时候，文艺界同人本着向来不逃避不屈服的精神，以笔为武器，争先参加了抗敌工作。有些同人，还到民间与军队里，去服务，去宣传，以便得到实际的观察与体验，充实写作的能力，激发抗战的精神。但是，在这神圣的抗战中，每个人都感到问题是怎样的复杂，困难是如何的繁多。即专就文艺本身而言，须怎样表现才更深刻？取何种形式才更合适？用什么言语才更有力量？都成为问题。就是印刷与推行也都遇到不少的困难，减降了宣传的顺利。每个人都想竭尽才力，切盼着相当的收获，可是每个人都遭遇到这定非单人独骑所能克服的艰难。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对国内，我们必须喊出民族的危机，宣布暴日的罪状，造成全民族严肃的抗战情绪生活，以求持久的抵抗，争取最后胜利。对世界，我们必须揭露日本的野心与暴行，引起全人类的正义感，以共同制裁侵略者。旷观全世，今日最伟大的事业，是铲除侵略的贼寇，维持和平；内察国情，今日最伟大的行动，是协力抗日，重整山河。在这伟大的事业与行动中，我们文艺工作者自然须负起自己的责任，而我们又必须在分工合作、各尽所长的原则下，倾尽个人的心血，完成这神圣的使命。为了这个，我们必须联合起来。

以人力来说，在我们当中，有些人也许因年事稍长，或事业变更，略示沉寂。可是无疑的他们曾经努力过，曾经有他们的园地与读众；在这危急存亡之秋，我们必须谦诚的献给他们以新的血液，使他们的老手也举起刚燃起的火把来。还有许多年轻的朋友们，因感于国破家亡的恐怖与激愤，不由的想拿起笔来，道出他们纯洁心灵中的愤慨。可是，他们的热烈或不足以帮助他们的文笔，这就有待于较有经验的作家们，去辅导、鼓励与批评，以增长他们以文艺为武器的作战能力，成为民族革命文艺的生力军。总之，我们必须把力量集聚到一处，筑起最坚固的联合阵营，放起一把正义之火，烧净了现在的卑污与狂暴。

就工作而言，我们各有各的特长与贡献，就是各自为战，也自有好处。不过，这到处是血腥与炮火的时节，我们必须杀开血路，齐心协力的反攻。我们必须有统盘筹妥的战略，把文艺的各部门配备起来，才能致胜。时间万不许浪费，步调必须齐一。在统一战线上我们分工，在集团创造下我们合作。这才能化整为零，不失联络；化零为整，无虞参差。遵

从团体的命令而突进奇击，才是个人的光荣；把每个人最好的意见与能力献给团体，才有雄厚的力量。在共雪国耻，维护正义下，有我们的理论。在善意的纠正，与友谊的切磋中，有我们的批评。在民族复兴，公理战胜的信念里，有我们的创作。在增多激励，与广为宣传的标准下，有我们的翻译——把国外的介绍进来，或把国内的翻译出去。有了这样的合理的、一致的配备与团结，我们所有的刊物必能由互助而更坚强的守住阵地，我们的同人由携手而更勇敢的施展才能，我们的工作由商讨而更切实的到民间与战场去，给民众以激发，给战士以鼓励。这样，我们相信，我们的文艺的力量定会随着我们的枪炮一齐打到敌人身上，定会与前线上的杀声一同引起全世界的义愤与钦仰。最酸辛，最悲壮，最有实效，最不自私的文艺，就是我们最伟大的文艺。它是被压迫的民族怒吼，在刀影血光中，以最深切的体验，最严肃的态度，发出和平与人道的呼声。今天我们已联合起来，马上就去做这个。能作到这个，我们才会严守在全文化界中的岗位，而完成我们争取民族自由独立与解放的神圣使命。

抗敌救国既是我们的旗号，所以必须沿着抗战到底的国策，把抗敌除暴的决心普遍的打入民间；同时，把民间的实况转达给当局。一方面我们竭诚的去激励士气民气，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揭发了各方面的缺点和弱点，以求补救与革新。诚心抗日的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妨碍抗日的是汉奸，我们的善恶分明，也希望全民族辨清是非。

在大会成立的今天，我们谨向全国受难流离的同胞作最同情的慰问，并谨向各界人士请求协助与指导！

选自《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 代表大会宣言^①

——一九四〇年(民国二十九年)

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抗战后两年半的今天开会了。首先我们要诚恳地代表全边区的文化界，向两年半以来在抗战中文化战线上牺牲了的战友们谨致深沉的悼念，并向目前在全国各地艰苦斗争中的文化界的战友们致崇高的敬意。

文化运动在抗战中是一条重要的战线，还在抗战以前，进步的文化界，就曾经努力奔走呼号，为着实现全国的团结抗战，发挥了很大的号召推动的作用；两年半以来，文化界更深入广泛地展开了自己的工作，许许多多的文化人，以及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或是深入乡村，或是走上前方，或是参加部队，或是留在都市，都积极地勇敢地服务于这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进步的文化界团结成一条坚强的抗日的文化统一战线，由于他们的不断的努力，提高了全国人民对于抗战建国的觉悟和认识，巩固了全国人民最后胜利的信心，加强了民族战斗的勇气和实力。两年半的坚强抗战，不但打击了敌人速战速决的迷梦，而且大大地打击了敌人的进攻力量，使抗战走上了相持阶段。这固然是全国人民从各方面的

^① 录自《文艺阵地》第4卷第11期。

坚持斗争的结果，而文化界的启蒙运动的扩大与深入，也在这中间起着很大的作用。

文化运动增强了我们民族抗战的力量，而在抗战中中国民族新文化也在进步着和成长着了，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斗争，改变了全国人民的生活，也改变我们文化人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参加到战斗中间，面对着血淋淋的现实，他们不能不在非常复杂而动荡的环境中锻炼起他们所使用的武器。进步的文化人在战斗中坚强起来，他们的武器是在锻炼中更锐利了。我们的教育家在努力施行灵活实际的抗战建国的教育，我们的艺术家努力把这悲壮辉煌的民族战斗的现实反映到自己的创作形象里，我们的理论家努力研究和把握中国社会过去现在以至将来的发展的具体规律，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努力探求中国抗战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和生产技术，进步文化的各部门的活动，其深入性和广泛性都远远地超过了抗战以前的各时代。尤其在华北和陕甘宁边区，这一切方面都表现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进步的创造过程。文化运动愈是能够进步成长，它就能够愈有力地推动广大的人民为抗战建国的任务进行坚决的胜利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者深知进步的文化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为着要达到奴化中国民族的目的，对于中国的一切进步文化，自始就极尽了一切摧残破坏的能事。无数的文化机关、学校、报馆曾在敌机的轰炸摧残下化为灰烬，无数进步的书籍和杂志、报纸曾遭到敌人的没收和焚毁，无数的文化工作者和青年知识分子曾遭到敌人的逮捕和杀戮。或在抗战的工作中，或在敌机的轰炸下，牺牲了性命。而在另一方面，他们更用了各种各样的文化上的欺骗和麻醉方法，凡是敌人铁

蹄所到的地方，我们的儿童教科书，就被修改，我们的历史就变成替奴化政策作辩护的历史。进步的文化被毁灭，封建时代的残遗的毒物就复活起来，“王道”、神、佛，以及一切能把人陷入迷信、愚昧、和奴性的深渊中去的旧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法宝就被使用起来。目前抗战已走到相持阶段了，它正加紧政治上和文化上的破坏阴谋。在政治上着重于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国共合作，在文化思想上就着重于伪造三民主义，曲解三民主义，企图使三民主义的内容，从抗战团结的纲领，变为投降反共或“和平防共”的汉奸纲领，并在文化界努力制造各种反动的复古的倒退运动，阻碍一切进步的能对抗战起推动作用的思想文化的发展。

一切这些文化上的阴谋活动，经过汉奸文化人，如陶希圣、周佛海之流来施行，而抗战阵营中暗藏的一切妥协投降分子的活动却正与他们互相配合着。今天我们看到中国政治上的危机，那就是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动摇妥协分子的抬头，就是一部分地主资产阶级上层分子的妥协投降活动的活跃。与这政治上的危机相应的，我们也看见了文化上的危机，那就是叶青之流的伪造的“三民主义”，竟可以公然在文化市场上广泛散布，复古的倒退的运动又到处流行，而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和知识分子，进步的文化思想，自然科学进步的教育，特别是那认识抗战发展规律的正确的指南针，在抗战文化中起了最大的推动作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科学思想，却在许多地方被剥夺了存在和发展的自由。我们要注意这一切的文化倒退现象，乃是妥协投降分子为要达到他们出卖民族的目的而进行的思想上的准备活动。

陕甘宁边区文化界的同人是在全国模范的抗日民主根据

地里工作着，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区，在无产阶级政党的立场上，在马列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这里实现了真正彻底的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在这进步的政治条件之下边区的文化工作是在抗战以来飞快地发展了，这里实施了足以为全国模范的抗战教育和普及教育，这里的理论研究，艺术创作，自然科学以及文化各部门不断地在获得进步，这里进步言论和出版事业得到了完全的自由，这里的文化工作者和青年知识分子们在生活上工作上和学习上都不致于徬徨无路。这一切成绩之所以能够产生，都由于这里有一个中国最进步的真正为广大民众所共有的新的民主主义的政权，由于这里有政治上思想上的自由条件，因此在文化上也走上了全国最先进的地位了。这自然并不是说边区的文化工作已经毫无困难和缺点，可以完全满足了。相反地，正因为边区文化在全国的先进地位，因此它的任务就更加困难，更需要与全国进步的文化界作更大的共同的努力。首先因为边区在过去是全国经济文化上落后的一部分地方，因此虽有抗战以来的飞速的发展，而这发展仍赶不上政治上的迫切需要。边区文化又是全国文化的一部分，在相持阶段上全国其他各地的文化上的倒退现象，不能不对边区的文化运动有影响，不能不为边区文化的发展增加许多的艰难，因此我们必须提出以下的任务，作为今后全边区文化界与全国文化界共同努力的方向。

第一，目前文化运动的总的任务是为着争取抗战建国的胜利，因此边区与全国的文化界应该更进一步在争取抗战建国胜利的目标下，广泛地团结起来，反对一切悲观失望和分裂倒退的思想，反对汪精卫、叶青之流的伪造的三民主义，

反对一切妥协投降的思想准备活动，提高人民对抗战建国的正确认识和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更加扩大和巩固而斗争。

第二，文化运动要能够有力地服务于政治，则它本身必须不断地进步发展，因此要努力提高文化的一切部门。在科学的立场上来批判地研究中国历史及中国旧来的学术，来认识抗战救国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作为指导全民族斗争的指南针，发展自然科学的研究，以求解决长期抗战建国过程中的物质上的困难；大量地利用一切有用的形式进行艺术的创作，努力使艺术走向大众，反映现实，更广泛地深入地进行抗战教育和普及教育——这样努力从各方面来提高文化的各部门，为创造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也就是为创造广大民众所需要的新的民主主义的文化而斗争。

第三，为要求文化运动的广大的进步和发展，必须以政治上的民主自由为基本条件，它本身必须获得在各方面各部门自由发展的机会，它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因此全国进步的文化界及进步的人士应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政治上文化上的一切倒退现象，反对新的复古运动，反对对于进步思想言论出版方面的压迫和限制，要求实现《抗战建国纲领》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决议中关于言论思想出版的自由和废除关于书报杂志检查禁止的法令。

第四，应该进一步在生活上和工作上帮助文化工作者，使他们有尽可能的优良的工作条件，使他们能更好地进行自己的工作，对于目前倒退运动中进步文化工作者所遭受到的徬徨失所的困难，要设法加以解除。要救济和帮助青年知识

分子，解除他们的失业和失学的痛苦，帮助他们使能有机会学习和工作。

全国进步的文化界的同胞们，以上四点，就是我们认为在今后文化界急需担负起来的任务。这些任务，在边区的文化界说来，由于有进步的民主的政治条件的存在，相信一定能够很好地完成。然而单单边区文化界的工作和努力，是不够的，必须有全国文化界的共同努力和互相帮助，才能够在抗战建国过程中展开广大有力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必须全国进步的文化界在争取民族解放，反对专制压迫，反对复古，破除迷信，反对独断，反对盲从，提倡科学，主张和争取思想自由的条件之下，团结起来共同斗争，才能够克服全国各地的倒退现象和一切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必须有这样的全国进步文化界的共同努力，各尽所能，为动员一切力量参加抗战，为创造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而斗争，才能够推动全国抗战建国的伟大事业，以达到最后胜利的目的。

选自《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丙编

三、关于文学大众化和民族形式的讨论

大众化与利用旧形式

茅 盾

文艺要大众化，没有人反对。尤其在此抗战时期，从前反对任何大众化的，现在也不再反对。

然而一到了利用旧形式这问题，意见就很多了；特别是因为利用旧形式的呼声太高了，有些朋友们从这里看出了“危机”，以为旧形式是早被新文学否定了的，现在又抬起它来，将来岂不又要再来一次文学革命。

这样的担忧，表面上是“持之有故”的；但事实如何？事实是：二十年来旧形式只被新文学作者所否定，还没有被新文学所否定，更其没有被大众所否定。这是我们新文学作者的耻辱，应该有勇气来承认的。

也因为事实是如此，所以七八年前文坛上第一次发生大众化的要求时，就已经讨论到旧形式利用这一问题。当时客观条件不利，终于不免“纸上谈兵”，抗战以来，这才把这久悬的问题放在伟大的试验工作的，也实在寥寥无几，意见就又分歧，乃至鳃鳃过虑于新文学宝座将有危险，这是从那儿

说起？

事情不是明白得很：既说是“利用”，当然不是无条件的接受。此时切要之务，应该是研究旧形式究竟可以被利用到如何程度，应该是研究并实验如何翻旧出新，应该是站在赞成的立场上来批评那些试验的成绩；皇皇然担忧于新文学之将遭殃，不免是扯淡而已。

据说另有些人则想利用这种现象（指利用旧形式之热闹）来威胁新形式，几乎要把新文学运动一笔勾销。但这不必担忧。新文学一向就在困苦挣扎中生长，决不是外力所能“勾销”。利用旧形式如果是新文学大众化过程中的课题之一，便应当尽力做去，不应怕这“利用”会被人反利用了去而怠工。现在抗战期中不少利用抗战以谋自利的恶势力，难道我们因此就不抗战了么？

新文学作者所当引以为惧的，倒是新文学的老停滞在狭小的圈子里。所以大众化是当前最大的任务。事实已经指明出来：要完成大众化，就不能把利用旧形式这一课题一脚踢开完全不理！一脚踢开是最便当不过的，然而大众也就不来理你。“文章下乡，文人入伍”，要是仍旧穿了洋服，舞着手杖，不免是自欺欺人而已。

选自《抗战文艺论集》

“民族形式”商兑

郭沫若

“民族形式”的提起，断然是由苏联方面得到的示唆。苏联有过“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的号召。但苏联的“民族形式”是说参加苏联共和国的各个民族对于同一的内容可以自由发挥，发挥为多样的形式，目的是以内容的普遍性扬弃民族的特殊性。在中国所被提起的“民族形式”，意思却有些不同，在这儿我相信不外是“中国化”或“大众化”的同义语，目的是要反映民族的特殊性以推进内容的普遍性。所谓“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便很警策地道破了这个主题。又所谓“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更不啻为“民族形式”加了很详细的注脚。这儿充分地包含有对于一切工作者的能动精神的鼓励，无论是思想、学术、文艺或其他，在中国目前固须充分吸收外来的营养，但必须经过自己的良好的消化，使它化为自己的血、肉、生命，而从新创造出一种新的事物来，就如吃了桑柘的蚕所吐出的丝，虽然同是纤维，而是经过一道创化过程的。

中国因为在封建经济中过于长期的停滞，一切事物都非

常落后，百年来已陷入于半殖民地的境遇。为要由这境遇中解放，百年来我们的民族也不断的在振作，不断的在吸收外来的事物以补救自己的落后。这在已往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就在今后是尤必须策进的事实。凡是世界上适合自己的最进步的东西，无论是精神的或物质的，我们都须得尽量的摄取。譬如我们在经济上便必须促进重工业的建设，在政治上便必须促进新民主主义的实现，我们是不能专靠外来生产品的输入，或仅挂上一个民国的招便牌可以满足的。假如由于我们民族的努力，我们的重工业建设成功了，民主主义实现了，同是根据于科学的原理原则所产出的成品不会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经过我们本民族自己的创造，便自然的赋与了“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也就是所谓“民族形式”。我们中国能够自己创造出来的进步的事物，难道还不是“新鲜活泼的”，难道还不是“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

譬如就是香槟酒也吧，威士忌也吧，只要不是纯粹的洋货，只要是酿造自中国人，和中国的材料，而且使“中国老百姓”都有领略的机会，我不相信他们就不会“喜”，不会“乐”。

又譬如我们目前所必需的飞机和坦克车之类，这可说纯全是外国形式，“中国老百姓”“闻”之，“见”之，已就不胜其“喜”，不胜其“乐”了，假如这些精锐的武器更经过了一道“中国化”，完全由中国人自己多量的把它们制造了出来，其为“喜”，其为“乐”，难道会不致增加万倍？

问题本来是很简单的，而且也不限于文艺，但一落到文艺上来，便立地复杂化了。“喜闻乐见”被解释为“习闻常见”，于是中国的文艺便须得由通俗文艺再出发，民间形式便成为

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这个见解我们认为是不正确的，如以“中国老百姓所习闻常见”为标准，那末一切形式都应该回复到鸦片战争以前。小脚应该恢复，豚尾也应该恢复，就连鸦片烟和吸烟的各种形式都早已成为“中国老百姓所习闻常见”，而且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所独有的“民族形式”，也有其合理的存在，那中国岂不糟糕！这本是浅而易见的道理，何独于文艺而发生例外？

中国新文艺，无可讳言的是受了外来的影响，这犹如重要的生产方式，经济机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以及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都是受了外来的影响一样。工厂、公司、轮船、铁道、汽车、公路、电信、电话、电灯、电梯、自来水、自来火、学校、政党、声光化电、朵列米伐，乃至大总统、主席、委员长、中华民国，那一样是“中国老百姓所习闻常见”的？如这一切都要从新来过一遍，以某种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为“中心源泉”，任何人听了都会震骇，何独于文艺而发生例外？

中国新文艺，事实上也可以说是中国旧有的两种形式——民间形式与士大夫形式——的综合统一，从民间形式取其通俗性，从士大夫形式取其艺术性，而益之以外来的因素，又成为旧有形式与外来形式的综合统一。而且凡中国近百年来的新的事物，比较上“中国化”了的，还当推数文艺这一部门。其他多半还是直接使用舶来品，竟连《中国社会史》之类都还在使用东洋货。就拿自然科学来讲吧，高级一点的学校都还在使用外国教本，且以使用外国教本为荣。各项部门的术语学名都还没有译定，或者也竟直使用东洋货。和这些比较起来，文艺究竟不能不说是较胜一畴的。尤其是关于